

# 近代以来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研究

□马君 王艺霏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或由传教士零散传入中国,或由有识之士主动引入中国,经历了以零星介绍为主、以日本为中介和以美国为蓝本的三个传播阶段。在对相关文献史料爬梳整理后,发现这三个阶段虽然在传播动机、传播途径和传播主体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单一性和自主性等特点,但都给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诞生、理念的交流以及实践的变革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启示当代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传播要立足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加强培养高素质的本土职业教育研究者,不断增强理论影响力。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中国;传播

**作者简介:**马君(1979—),男,宁夏同心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与政策、比较职业教育;王艺霏(1997—),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与政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22)01-0025-10

早在公元前,我国就有了职业教育的萌芽<sup>[1]</sup>,但直到进入近代社会,各类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思想在不同传播主体的引介下轮番登场中国后,中国职业教育理论才逐渐形成并体系化。回顾梳理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历程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摸清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起源的需要。历史上,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较为系统的学术根源却是来自于西方。随着世界各国教育交流的广泛与深入,交流传播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也越来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对待职业教育交流传播的历史,科学地总结历史传播中的经验,是关系到我国职业教育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重大问题。二是弥补关于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学术传播史研究的不足。中国教育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sup>[2]</sup>,为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国在全世界广泛拜师,向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习从未止步,但是中国职业教育学术史上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持续研究却非常少见。以“西方”“职业教育”“传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主题搜索,仅获得6篇文

献。这些研究要么是局部历史陈述,要么是借助于教育学传播特点进行宏观叙述,都没有系统地梳理近代以来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具体传播历程及其特点。三是这些理论思想本身具有的重要价值亟需深入挖掘。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我国教育科学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我国近代以来的教育交流史进行梳理,如周谷平、田正平和邹振环等学者,出版了《中外教育交流史》《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等书籍,都为职业教育理论东西方交流的历史梳理提供了方向与指引。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比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时间早,其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与推动者。这些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思想能够被选择,最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被学习和镜鉴,展示出了理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 一、传播背景

纵观中国职业教育学术发展史,实质上是一次东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一般来说,跨文化传播包括单向性的直接传播、通过第三方交流的媒介传播以及一方传播主题刺激另一方传播主题的激起

传播三种类型,对应近代以来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形式,分别为个别传教士的单向传播、通过报刊译介的媒介传播以及中国学者编译职业教育书籍的激起传播。这些传播之所以能够进行,离不开以下三方面的背景因素。

首先,从理论本身来看,这是国内外职业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西方职业教育理论进入中国是世界职业教育理论发展扩充的必然结果。17世纪,西方的一些教育家和思想家开始向传统的师徒制挑战,提出了建立职业学校的理论,初步孕育了职业教育学。19世纪工业革命浪潮波及欧、美两洲,职业学校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欧美职业教育学进入了萌芽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狂潮席卷世界,人类社会进入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各国先后通过立法建立了正规的职业教育制度。从那时起,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交通工具的改进,再加上西方殖民主义为了拓展世界市场,用大炮和兵舰迫使中国等亚洲国家国门洞开,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其裹挟下不请而至。外国人进入开始中国大规模传播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拓展了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广度,使得职业教育理论在全球开始传播并发展。另一方面,这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难以内生困境下的必然之举。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虽然源远流长,但明清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近代以前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一直处在较为原始的状态。没有完整职业教育理论指导的职业教育实践就像是无头的苍蝇得不到有效发展,而职业教育实践的落后又使得职业教育理论难以内生。在这种困境下,向国外引进学习便是发展中国职业教育理论最便捷、最高效的方式之一。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是顺历史潮流之举,能够促进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明末清初之际,中国近代工业在封建制度上破土而出,我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政府举办的洋务运动创办了我国最早

的近代军事工业、燃料工业、采掘工业、交通运输工业和电讯工业等,后来又创办了少数民用工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这些近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需求量暴增,要求把科学技术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冲击了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传统教育,从而带来了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重大变迁。中国传统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教育再也不能适应这种潮流,职业教育作为与大机器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教育类型,必然会出现新的教育模式来取代传统的培养模式,引进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就是必然的选择。于是开始出现传播学习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中国人。例如,以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清廷洋务派,他们在办洋务、搞实业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要摆脱清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所面临的困境,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他们在办洋务、搞实业的同时,积极学习西方职业教育思想,努力培养各种能掌握机器生产技术和使用先进武器的人才。李鸿章在为创设天津武备学堂上皇帝的奏折中曾写道:“我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sup>[129]</sup>。虽然洋务派倡导新学的主张实质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但是他们先进的职业教育思想冲击了几千年来读经学史的传统教育,使中国职业教育有了良好的开端。

再次,从国内外传播交流来看,是因为这些理论思想与中华文化之间具有文化契合性。众多的外国职业教育理论能够在中国传播,除了当时政治、经济等外部的背景性因素,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思想与中华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国教育传统的内在契合。以杜威为例,据听过杜威讲课的杨亮功回忆,杜威“不善言辞,有时使用艰深字眼令人难解”<sup>[13]</sup>,在枯燥无味且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杜威的职业教育理论能传遍中国大江南北似乎不合常理。但是仔细研究杜威具体的职业教育理论就可以发现,促使杜威广为人知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杜威职业教育理念本身的原因。杜威的职业教育理论根植于

20世纪初的美国,那时的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经济迅速发展,承袭西欧教育传统而建立起来的美国教育体制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美国化民主社会的需要,无法有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伴生问题。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杜威主动以社会作为研究范畴,强调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要求人类认识自己生活在集体化时代,要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他在杜威学校按照自己“学校即社会”的理念,致力于把学校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方式,使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协调。杜威的这些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所追求的集体主义、内圣外王、德政教化等异曲同工。而此时处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同样也经过了几十年的痛苦转型和艰难演进,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都进入了发展的转型期和关键期,清末以来形成的中国化的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难以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以及新文化运动对于教育的新要求,这时在美国广受推崇的杜威教育理论来到了中国,满足了当时中国迫切呼唤新的教育价值观、教育思维和教育思想的需要,因此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

## 二、传播的历程及其特点

清末民国时期是继隋唐时期佛学东来、明清时期西学输入以来,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规模地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sup>[4]</sup>。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根据不同的层次和水平,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以零星介绍为主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以日本为中介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和以美国为蓝本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

(一)以零星介绍为主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及其特点(1900年之前)

根据黄炎培的研究,光绪三十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在《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祥文》一文中最早使用“职业教育”一词:“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虽然“职业教育”一词直到20世纪初才在我国出现,但职业教育实践早已产生,国外相关职业教育理论也早已在中国传播。1900年之前是近代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一

个阶段。

清末,大批传教士传教过程中夹杂着的职业教育理论唤醒了国内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职业教育的意识。德国同善会传教士花之安是清末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早在1873年他就在中国出版了《德国学校论略》,这是鸦片战争后比较系统地论述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山之作。它介绍了德国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及高等专门学校,提出在西方培养国家需要的人员,比如火轮车者、电报者、书信馆、大农师、森林管理者等,都是“非考取以为官者”。1897年,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也与光绪进士任廷旭一起合译了森有礼的《日本的教育》,并题中文书名《文学兴国策》。书中对美国职业教育进行了详细介绍: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后各类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美国设立了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以造就各类专业人才,“使他年学业有成,或精于机器,或熟于驾驶,或工于造船,或巧于建屋,或明于五金,或善于制造,无一非国中有用之人”<sup>[5]</sup>。

除了主动来华传播的传教士,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还曾派遣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前往日本、美国、法国等七国考察教育,丁韪良在考察结束后撰写了《西学考略》,对西方职业教育发展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一些大学增设工科、农科,且随着现代工业及产业的发展,“营造馆”“冶矿馆”“机器馆”“农政馆”“船政馆”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也不断出现。这都为晚清政府推行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镜鉴,成为了当时指导清政府职业教育改革的一本重要参考书。除此之外,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传播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代表性人物中有驻外公使郭嵩焘、黄遵宪,还有留学生颜永京等。而第一个系统引介欧美和日本职业教育理论的中国人是商人出身的郑观应<sup>[6]</sup>,他于1893年正式出版的《盛世危言》曾在当时社会中受到热议和推广,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除了个人自发翻译外,一些机构也进行了有组织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是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的翻译馆以及美国传教士举办的广学会。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为应对火药、炮法、汽机等知识的匮乏而

设立翻译馆,聘请徐寿、华蘅芳以及外国传教士傅兰雅等人译书,涉及兵学、电学、工程等多个类别。而美国传教士 1887 年创办的广学会主要出版基督教教义基础的图书,职业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书中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工匠境遇的描述使人们对当时英国的织匠等职业有了新认识:“至于织匠,一则因大兵之后国殇相望,穿衣人之少,一则因新创织布机器人力不能敌,故佣值竟贱一半”<sup>[7]</sup>。另外还有 1896 年京师同文馆增设的东文馆,翻译了《电理测微》《药材通考》等应用科学书籍,开创了国内官办日语译介职业教育的先河。

这一阶段的传播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传播主体的垄断性。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虽然驻外公使和留学生等中国社会群体也参与了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但却是一个极小的群体,翻译力量薄弱,而懂外语的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无法独立实施翻译行为。

二是传播动机的差异性。传教士对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传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宗教,严复曾在他的《译书略论》中指出花之安等传教士“译书之宗旨:传路德教(基督教)”<sup>[8]</sup>。而此时进行教育理论传播的中国人多属于洋务派,他们主要是想为洋务学堂培养军事人才,以此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例如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的翻译馆翻译的书籍《制火药法》《行军指要》《克虏伯炮说》等,都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军事性。

三是传播内容的零散性。传教士们大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喜好来选材,散见于其他译著中,肤浅而又零碎。如花之安在他的《德国学校论略》一书中介绍了“技艺院”“格物院”“农政院”等职业学校<sup>[9]</sup>。后来,丁韪良出国考察后撰写的《西学考略》也介绍了随着现代工业及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营造馆”“冶矿馆”“机器馆”等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情况。郭嵩焘也曾在其游记《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提到了法国圣西的“农田学馆”“通商学馆”“草木学馆”等实业学校。

四是传播途径的单一性。主要采用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基本上是外国传教士口述,中国人笔录,错误率较高且效率低。绝大多数的中国传播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外国传教士的“傀儡”,他们对选择合适的传播途径与内容既无权利更无意识,使得这一时期的传播大多难以落地。

五是传播效果的局限性。从成效来看,并没有引起社会广泛重视。在清末,由于传教士所选择翻译的东西与中国人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他们的论著大多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并未对中国职业教育产生深度影响。而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要么受政治经济条件制约,要么由于语言文化不通,大多对于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传播与学习限于皮毛层次,随机性较强且系统性差。

(二)以日本为中介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及其特点(1900—1910 年)

晚清的教育近代化,日本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很大作用。甲午中日战争后,很多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发展近代教育的重要性。而当日本在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获胜后,这一认识更促使中国开始以日本为中介着手构建近代化教育事业,由此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开始借道日本大规模地向中国传播。这一阶段以考察为主要手段,以学务官绅为主要力量,以教育理论书籍为主要载体,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大量传入我国,形成了近代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

19 世纪 70 年代初中日建交以后,中国官绅东渡游历、考察者渐多,写出了一批通过介绍日本职业教育来传播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游记著作。1898 年,清政府第一次派遣官员姚锡光赴日考察,后姚锡光在其所著的《东瀛学校举概》一书中详述了日本官立、公立、私立三类别学校的办学状况,涉及多所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sup>[10]</sup>。1901 年 9 月,清政府下兴学诏后又下令各省督抚遴选在职官员和学生派送至日本游历游学。此后,更多学者纷纷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撰译介绍、出版了大量著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吴汝纶的《东游丛录》<sup>[11]</sup>。书中涉及教育机构 40 所左右,详述了商船学校、水产补习学

校、实业补习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东京职工学校以及东京裁缝学校、共立女子职业学校等日本实业学校办学实践状况和学校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另外,还有1903年缪荃孙的《日游汇编》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先进性,书中缪荃孙首次关注到了日本“一壁讲求实业,一壁研究师范”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方式。从理论上强调和区分了实业师范和普通师范的异同,“初级师范,只学普通学。故实业师范,不啻合实业学校与师范学校而为一校也”<sup>[12]</sup>。

随着清政府的大力倡导,1904年后的教育官员赴日考察学务逐渐制度化,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赴日考察学务的热潮,为中外职业教育交流史上之罕见。下表为1900年至1910年部分赴日考察职业教育游记的相关书籍及作者。

表1 1900—1910年赴日考察职业教育游记一览表

出版年份	书名	作者
1900	东游日记	陈宝琛
1902	日本学校章程汇编	陶森甲
1903	日本学校图论	关庚麟
1903	游日本学校笔记	李鸿膏
1903	瀛洲观学记	方燕年
1903	癸卯东游日记	张謇
1903	癸卯东游日记	林炳章
1903	东瀛纪行	胡景桂
1904	日本普通学务录	杨沅
1904	日游笔记	王景禧
1907	东航纪游	李文幹
1907	东游日记	黄黼
1907	日本最近政学调查记	逢思承
1907	藤盒东游日记	楼黎然
1908	东瀛参观学校记	吕佩芬
1910	日本留学参观记	萧瑞麟

注:统计数据来自于实藤惠秀.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王寶平.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从现有资料来看,20世纪的前几年,派遣官绅到日本游览学习是为了给下一阶段全方位地学习日本作准备。1904年由张之洞、张百熙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则标志着清政府正式大规模学习日本。

相比于上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传播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传播动机的官方性。1900年至1904年前后,正值清政府酝酿颁布新学制时期,访日的官绅或受张之洞、刘坤一等清廷重臣委托,或间接与朝廷有关系。他们考察后传播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教育制度、教育宗旨等大政方针方面,其理论最终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例如“癸卯学制”的参考材料之一就来自于去日本实地考察学务的姚锡光向张之洞上的《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

二是传播载体的包容性。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均设有教育专栏。相较于图书专著来说,报刊的内容包容性强,可以包容大量的文字和照片等信息。例如我国最早的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自1901年创办之后,翻译引介了《实业学校令》等多个职业教育理论与规范。另外,报纸的价格低廉,内容通俗易懂,对于受众也有较强的包容性。

三是传播主体的主动性。传播主体由传教士到派遣官员这一角色的转变,标志着国人初步掌握传播西方职业教育的主动权、话语权。但同时,虽然这一阶段的传播者比上一阶段的数量激增,而真正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却依然屈指可数。他们中很多人只是简单译介或描述西方职业教育而不加批判,使得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发展仍较缓慢。

四是传播效果的广泛性。一是如罗振玉《教育世界》和吴汝纶《东游丛录》为新学制的建立起到了舆论导向和宣传介绍的作用,直接影响了清政府实业教育制度的确立。二是1904年以后赴日的具体办学人员和中下级学务官员,其理论传播的重点都主要放在了如何办学方面,影响了省州县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情况。三是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几经转手后通过日本传入中国,使得理论质量难以保证,这就促使学者们挖掘学习一手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学者对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兴趣。

(三)以美国为蓝本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及其特点(1911—1949年)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日益暴露,以日为师逐渐式微。而美国此时减免了部分庚子赔款作为

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计划的基金,于是美国逐渐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榜样。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境内的日本教习几乎全部回国,中国人开始直接学习美国职业教育理论,一直持续到1949年。其中1911年到1915年是过渡期,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高潮,直到民国后期走向衰落。

在过渡时期,中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sup>[13]</sup>。担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sup>[14]</sup>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迫切希望通过学习美国的职业教育进而实现教育救国理想,出现了很多象征着职业教育理论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学著作。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这一时期的传播著作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主,对各国职业教育的沿革与现状进行宏观介绍。例如1915年黄炎培访问美国后出版的《黄炎培调查美国教育报告》对美国的职业教育状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联络的方法等都进行了详细介绍。二是出版了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译作,其中包括首次对职业心理学进行关注的邹恩润《职业智能测验法》<sup>[15]</sup>。三是出版了专门研究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著作和论文集。其中朱元善的《职业教育真义》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译介为主,掺以朱元善个人研究,被称作“20世纪初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拓荒之作”<sup>[16]</sup>。

这一时期译介的部分职业教育类具体书目如表2所示。

除了通过资料学习国外职业教育,当时还邀请了一些美国教育专家来中国讲学,其中杜威的来华交流格外瞩目。杜威把职业教育视为平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生常道直将杜威在北师大讲授的教育哲学整理编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书中第二十六章从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等方面专门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另外,杜威在苏州和福州以《教育与实业》为题发表的两次演讲,在中华职教社等处以《职业教育之精义》《职业教育与

表2 以美国为蓝本的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传播书目一览表

年份	书名	作者	出版者
1915	黄炎培君调查美国教育报告	敦延谟笔记	北京教育部
1916	职业教育论	朱景宽编译	商务印书馆
1917	职业教育真义	川本宇之介著 朱元善译述	商务印书馆
1919	职业技师养成法	秋保治安著 熊崇煦译	商务印书馆
1919	职业教育参考书	熊崇煦译述	教育部编审处
1923	职业智能测验法	邹恩润编译	商务印书馆
1923	职业教育研究	邹恩润编译	中华职业教育社
1925	小学职业陶冶	勒维特、布朗著 杨鄂联、彭望芬译	商务印书馆
1925	德国工商补习学校	培伦子著 陆振帮译	中华书局
1926	实业教育	利克著 王长平译	商务印书馆
1926	女子职业训练谈	麦甘佛著 金振华译	商务印书馆
1927	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	顾树森编译	中华书局
1929	欧美的劳动教育	山田敏一著 赵仰夫译	上海新学会社
1935	工作学校要义	凯兴斯泰纳著 刘钧译	商务印书馆

注:统计数据来自于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教育·体育[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劳动问题》等为题的多次演讲,都对什么是职业教育进行了详细论述,对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发展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sup>[17]</sup>。

随着对美国教育理论的深入学习,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界经过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的多方位比较,最终选择了以美国职业教育为蓝本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并从学制等方面不断深入与加强。

这一阶段的传播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传播动机的明确性。此时职业教育理论的传播是“一种通过分享、交换信息进行相互识别的互动过程”,中国学者学习国外逐渐有了明确的学科发展意识。受此目标驱动的学者们想通过学习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为自己所用,以此来完善中国职业

教育理论并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样态。

二是传播主体的自主性。这一阶段的传播者逐渐有了主动选择思想与流派意识,出现了如蔡元培、胡适等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教育家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最早资料是蔡元培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纳入他所提倡的实利主义教育范畴。而介绍杜威思想最积极的“中介人”是胡适,他积极参与发起邀请杜威来华的活动,还在北京大学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培养了解并传播杜威职业教育理论的一大批新青年。

三是传播内容的专业性。这一阶段既有对一般理论与国际职业教育现状的描述,也有对国外经典著作的翻译,还有基于学科发展的理论引介。例如1935年刘钧对德国凯兴斯泰纳所著的《工作学校要义》进行了翻译,还有首次关注到儿童职业陶冶问题的杨鄂联、彭望芬所翻译的《小学职业陶冶》等。这些书籍从专业视角探讨了职业教育多方面的思想理论,为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初步理论准备。

四是传播时间的持续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以美国为蓝本的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持续传播了三十余年,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对中国之影响远超其他国家。尽管在后期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反思的力量始终是相对弱小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时。

五是传播途径的直接性。相比于之前,这一阶段学者们在翻译西方职业教育论著的时候不再使用中间媒介,而是从产出国直接学习;不再以翻译二手理论著作为主,而是直接翻译原本为主。报刊连载的浪潮也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正式出版的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更加强调“著”“译”结合。

六是传播载体的多元性。《教育与职业》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一份对职业教育进行长时间专门关注的刊物,在其创办期间至少将41个国家的职业教育状况介绍到中国,尤以介绍美国的文献为最多。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于西方职业

教育理论进行专门传播。自1917年至194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出版著作110余种,包括国外职业教育经验介绍、职业教育论文集及该社的事业介绍等多个方面<sup>[18]</sup>。

### 三、主要影响与当代启示

近代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影响了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在当下职业教育大发展时代,如何正确看待这些历史,并从传播活动中汲取经验,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 (一) 主要影响

1. 为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近代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未曾有人提出过有关职业教育理论的系统学说。直到1917年,朱元善编译的《职业教育真义》全面地探讨了关于职业教育的意义,才成为了我国第一本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书中首次将职业教育的意义区分为两个重要方面,即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的意义。而对职业教育个人意义的重视是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理论所未能意识、未能重视的方面,直到后来这种思想才为学界认同并多所阐释。还有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智能测验法》也是当时国内第一本关于职业心理学的系统著作。职业指导在当时的中国属于“一件创闻的事”,邹韬奋通过撰写文章和著作比较详细地介绍美国等职业指导发达国家职业指导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情况,增进了国人对职业指导的了解和接受。

不论是朱元善还是邹恩润,他们都试图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大箩筐中,挑选出适合中国职业教育学发展的先进理论。最终,这些理论在黄炎培、顾树森等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开阔了中国人关于职业教育的视野,使国民认识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理解,为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参照,启发了国人对职业教育理论进行进一步探讨与研究,也为中国职业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推动了中外职业教育理念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教育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教育相互

交流并不断创新的历史。清朝国门被打开后,来自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逐渐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众多出国参观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的情况进行细致观察后,从制度、政策和实践多个方面,使用书籍或演讲等形式向国内广泛进行介绍。1910年之后,在胡适等人的邀请下,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等学者也先后在中国传播其思想,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

在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外国人和中国人、传播者和受众双方思想在交流过程中有接触、有交锋,更有促进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双方职业教育思想的升华与实践都有所启发。杜威曾在即将离开中国之时说:“这两年是我生活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中国是一个教育的国家,外来人能在知识上引起好奇心,感情上引起好理想,并且也能引起同情心,故到中国来旅行者很是有益”<sup>[19]</sup>。

随着国内外职业教育交往的频繁,中国当时的职业教育与国外新思想新理论不断碰出火花,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的接轨,使得中国职业教育学人明确地意识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必要参考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大体趋势,激发了世界职业教育理论的碰撞与发展。

3.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理论水平的提升与实践的变革。民国时期,我国无论是个人生存发展还是关乎国民生计的社会发展都迫切需要职业教育,但是由于缺少办学经验、缺乏理论指导,职业教育开展得并不顺利。一些回国的留学生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积极把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引介到国内,阐释了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等基本理论问题,使国人认识和了解了何谓职业教育、为何办职业教育。他们还讲述国外职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使接受并倡导职业教育的人士知道如何开展创办职业教育。例如庄泽宣留美期间就撰写了数十篇介绍美国职业教育的文章在国内发表,顾树森通过江苏教育研究会出版了《德美英法四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表解》等专著。这些文章和译著为国人介绍了世界先

进的职业教育思想,使中国传统的实业教育逐步与世界先进的职业教育逐渐接轨,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产生与更新。他们在对国外职业教育的不断引介中,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力行倡导职业教育,他们为中国职业教育体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促进了现代职业教育在我国生根发芽。

回顾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国外职业教育的影子,从洋务运动建立实业学堂,到颁布正式确立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癸卯学制”,再到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一次次国外新思想的引进,都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中国人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改革及理论水平的提升。

## (二)当代启示

1.从传播内容来说,要立足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杜威曾在我国作讲演时说:“一国的教育绝不可胡乱摹仿别国”<sup>[20]</sup>。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和理念都不相同,职业教育的侧重点和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我国出现的一开始,就是为了弥补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职业教育发展差距,就是为了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为中国职业教育实践寻找更多的理论指向。

近代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再到本土化发展的过程,广大职业教育学人博采众长、融汇中西,在职业教育领域进行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各种职业教育理论兼容并包,异彩纷呈,逐渐走出了一条扎根中国大地的道路。黄炎培先生曾在《怎样办职业教育》中讲到“中国职业教育欲摆脱对西方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强大依赖性,就必须考虑本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扎根中国实践,开展职业教育学术研究”<sup>[21]</sup>,但如果一味不加辨别地模仿,就只能是“邯郸学步”。新中国成立后,昔日国弱民穷的中国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历史巨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高度实践性的教育类型,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的关系,在深入了解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学习西方职业教育先进理论,充分考虑教育理论的连贯性与适用

性,以理论滋养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2.从传播者来说,要培养高素质的本土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民国时期,进行职业教育理论传播的传播者有传教士、商人、官员等各种类型,多样的传播者在中国职业教育学发展之初,受限于我国当时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尽可能地利用各自渠道引进国外理论确系无奈之举。但同时由于其专业水平的限制,使得职业教育经验的研究远多于理论的研究,造成职业教育理论停留在表层泛泛而谈。中国职业教育学是舶来品,学科理论至今尚未系统化,再加上外在依赖性较强,职业教育学的专业化程度一直不高。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强大的文化抗震性使得我们必须考虑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也就必须要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本土研究者。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引介虽然在前人的努力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仍存在片面化、单一化等问题,引进、模仿、转变也不再是传播的重心。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要想高质量持续发展,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这些都对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引进与传播以我国实际为起点,积极培育职业教育内在力量,培养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恰当的方法论的研究者,尽快增加反思与探索职业教育学的角度,突破单一、封闭的思维方式,努力结合中国职业教育实践,传播并发展具有专业化的理论体系,从而在世界职业教育领域确立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话语地位。

3.从传播效果来说,要更加强调理论的影响力。根据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来看,传播效果是传播的最终目的。跨文化传播的效果指文化本身能得到受众的认同,在受众心里建立起正面积极的形象,并对受众的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教育思想的传播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虽然在本质上中国与西方理论是一种双向关系,但是在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在一开始是通过学习与模仿西方成长起来的,对大部分西方理论的传播与研究往往是单向度

的,中国学者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大量地译介西方各种职业教育理论,但并没有引起中国教育学界的重视,更谈不上西方社会的关注。而中国职业教育要想发展,关键在于要以中国为中心进行创新。一味地译介西方理论著作而不加批判、不强调影响力,充其量不过是西方理论的信徒或代言人,也就不具备与西方国家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资本。

回顾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播者对于外国职业教育理论的传播从未间断,但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许多游记甚至很多著作都沉寂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最终没有达到应有的传播效果,使得职业教育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不大,中国职业教育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微。这些都说明了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要从传播效果出发,要努力寻找并传播对中国职业教育学建设的有效资源,不断提高扎根中国大地的职业教育理论影响力,这样才能凝聚与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平等对话的资本,办好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

#### 参考文献:

- [1]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 [2]侯怀银.教育学“西学东渐”的逻辑探寻——西方教育学在20世纪中国传播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20,41(8):40-55.
- [3]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M].合肥:黄山书社,2008:38.
- [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5.
- [5]森有礼.文学兴国策[M].上海:上海广学会印译图书集成局,1986:7.
- [6]彭千梓,夏金星.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实业教育思想[J].职教论坛,2011(19):93-96.
- [7]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泰西新史揽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52.
- [8]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61.

- [9]许美德,巴斯蒂.中外比较教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10.
- [10]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
- [11]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672-691.
- [12]缪荃孙,王景禧,双寿.日游汇编 日游笔记 东瀛小识[M].长沙:岳麓书社,2016:16.
- [13]王宝平.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8.
- [14]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M]//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5]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序.
- [16]米靖,陈翠翠.20世纪初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拓荒之作——朱元善及其《职业教育真义》[J].职业技术教育,2012,33(18):70-73.
- [17]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4.
- [18]杨卫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8):69-73.
- [19]陈文彬.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访华的台前幕后[J].兰州学刊,2006(7):56-58.
- [20]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33.
- [21]黄炎培.怎样办职业教育?敬告创办和改办职业教育机关者[J].教育与职业,1931(127):525-533.

责任编辑 韩云鹏

##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ies in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Ma Jun & Wang Yife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P. R. China)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either by missionaries sporadically or by people of insight actively.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communication stages including sporadic introduction, Japan as the intermedia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blueprint. After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three stage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ce, unity and autonomy in communication motivatio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communication subjects, they have brough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birth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discipline, the ideological exchange and practical revolution. It enlightens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ies should be based on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high-quality lo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ers, and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influence constantly.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period;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a; dissemination